



让人生

更美好

——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

吴德铭 主编

作家出版社

作品选

PDG



让人生更美好

——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作品选

吴德铭 主编

作家出版社

序一：一片冰心在玉壶

梁晓声

吴德铭先生是云南艺术学院的教授。从年龄上说，是长我半代的人。

三年以前，他在云南艺术学院办起了作家班。个中酸甜，无须详述。

作家班曾是八十年代的新生事物。很使有文学向往的人们羡慕过的。比如北京大学的作家班，比如武汉大学的作家班，都真的造就过几批后来领骚文坛的作家。如今作家班的名气是特别的颓落了。因为想当作家的人不再像从前那么多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诗、小说、散文，都已先后沦至低谷。比中国电影界的情形略好些，比中国话剧的情形更好些，却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些纯文学的刊物，或者纷纷易帜变成了综合性刊物，或者已经根本不存在。存在着的中，倘不依赖对文学有同情心的商企家们的赞助，分明的就办不下去了……

在这么一种大局面之下，云南艺术学院的作家班，却一如既往地云南省热爱文学创作的人们服务着。而吴德铭教授的服务之心，有增无减。

这很令我感动。

我觉得，这是一些热爱文学创作的人们的幸运。也当然是文学本身的幸运。起码，在云南省，是可以这么看的。

吴德铭教授的努力，绝非孤立无援的一己的努力。云南艺术学院的领导们很支持作家班的教学活动。云南省的领导者们也很支持。两

种支持，依我想来，也是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的幸运，也是吴德铭教授的幸福。

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在云南这片红土地上，靠了有吴德铭教授这样为文学的未来不遗余力的人士，靠了理解他这份热忱的院领导和省领导的支持，默默地培育和播撒着文学的种子。

归根到底，作家班的存在，是以热爱文学创作，说得再平易一点儿，是以热爱文学写作的人们的存在为前提的。

倘竟没了这些人，作家班又为谁们去办呢？

所以，在云南省，居然仍有不少热爱文学写作的人存在，真是令人为文学备感欣慰的事啊！

吴德铭教授向我这样介绍：他们中有教师、编辑、医生、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武警战士、公安人员、科技工作者……五行八作的人都有，各种年龄的人都有。他们并不孤注一掷地沉浸在作家梦中。他们都是些本职工作的敬业者，也都是些非常热爱生活的人。他们并不打算靠写作创收。他们是些把热爱文学写作和热爱生活联在一起的人，时代不是号召人们要提高自身综合的文化素质么？他们正是些希望通过文学写作实践使自己变得更美好的人……

这就尤其令人感动了。

我是相信通过文学写作之实践，能使男人和女人变得或多或少有些书卷气的。

因为谁如果热爱文学的写作，他或她则必是先对文学发生了阅读的兴趣。而阅读的习惯，乃人类最古老最良好的习惯之一。书卷气是由此习惯形成的。无论是男人或者女人，有了别种样呈现优秀的气质，进而又有了书卷气，则他们或者她们的气质，所呈现的气质内涵就更其丰富了。即或本无气质可言的男人或者女人，由阅读由习写而渐有了书卷气，也等于是有了人最特殊的气质之一种。

是的，书卷气，的确是最特殊的气质。在当代，几乎是宝贵的气质。

所以，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的文学学员们，自觉地将热爱文学写作和热爱生活联在一起，自觉地希望通过文学写作实践使自己变得更美好——这一种心愿，不能不说是很美好的心愿。

这使人真的不由不联系到所谓“法轮功”而沉思——为什么，在中国，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舍得花那么贵的钱整套整套地买些内容愚不可及的“法轮功”读物，却舍不得钱买值得一读的书呢？为什么将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愚不可及的练功中去，却不能静静地坐下来读读文学呢？

倘说当代中国作家的书都不值一读了，那么我们古代的文学中，还留给了我们许多经典吧？倘连我们古代的经典似乎也不值一读了，还有许多翻译过来的世界名著吧？我从旧书摊上买了一本仍较新的《唐诗精选》，才花了三元钱！

我相信读书习写也是最好的修身养性，陶冶性情的方式，比什么“法轮功”效果强多了。

习写总是要有点儿天分的。但阅读只需要认识三千字以上，就几乎什么书都可以读的了。我没见哪一个练功的人脸上真有仙气道气，但我的确从几乎一切有阅读习惯的人脸上看出过使我觉得可亲的书卷气。

故我认为——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的学员们，那些将热爱文学写作与热爱生活，与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自觉联在一起的普普通通的人们，他们对于阅读和习写的理解，是值得我们这个民族因而反省的……

现在，吴德铭教授的学员们向他交卷了——便是这一本集子。他为他的学员们的这一本集子的出版，亲任主编，投入了不少心血和精力。

这一本集子中的某些篇章，也许还较稚嫩——但我们一想，是些并不打算当作家，仅仅出于对文学写作的热爱的人写的呀，那我们还有必要以过分专业的文学评论的眼光去挑剔么？

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我祝它的学员一年比一年提高。

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的学员们——我祝你们的文学习写实践，真的使你们的人生更有质量！

1999年8月31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梁晓声，原籍山东省荣成市，1949年9月22日生于哈尔滨市。1977年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主要著作有：小说《雪城》、《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纪实文学《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世纪末的证明》。

序二：让生活更美好

吴德铭

开拓和扩展新的精神空间。

致

吴德铭教授

王蒙 一九九九年六月

云南艺术学院作家班，是全国综合艺术大学和西南地区高校中的第一个作家班，其宗旨是培养、造就高层次的复合型文学创作人才，为社会主义文艺的苗圃浇水施肥，为建设精神文明的大厦增砖添石。在本班首批学员经过三年学习即将毕业之际，我们将学员们在校期间发表的部分作品选编成书，并借此时机追溯本班艰难曲折的创办历程，反思和回味教学中的甘苦得失，这对于探索和研讨文科（特别是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改革也许不无助益。

一、创办作家班的原委始末

每个人在少年儿童时期都有自己的美妙的梦幻。不知是由于“人之初”的天性，抑或是文学本身的神奇魅力，成千上万的人自幼都如痴如迷地嗜爱文学，对作家们无限崇敬和仰慕，乃至于是做着缥缥缈缈的作家梦。鄙人亦曾经陷入如此天真烂漫的梦境，记得在北京读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命题作文《我的志愿》，我竟毫无顾忌、大言不

惭地秉笔直书：“长大了要当一名作家。”我虽然终于按照自己的志愿考取了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大学的中文系，但是毕业后并没能成为一个作家。我的终生职业是一名普通的教师。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教学业务一直没有脱离文学范畴。这使我逐渐孕育和萌生了一个意念：我自己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已无望成为一名成绩卓著的专业作家，可我从事的文艺教育工作是有益于培养文学创作人才的。于是我又油然做起另一个美梦来：办个作家班，为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搭桥铺路，帮助他们走向荆棘丛生而又鲜花盛开的作家之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云南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时，受省文化厅委托，参与并主持创办了一个戏剧文学干部专科班（1984—1987年），这是西南地区高校首次开办的以培养剧作家为目标的教学实体。在该班的教学计划及其具体实施方案中，即非常明确地强调，学习编剧，首先要打好深厚的文学基础。学生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和一定的写作实践，对于各种主要文体（如诗歌、散文、小说等）的基本特征和艺术规律具有相当的理论知识和感性领悟，同时，在文学语言的操作上功底扎实，训练有素。我们倡导：一个优秀的剧作家，应该是一专多能的文学家。因此，要求学生不仅要系统地学习编剧理论、技巧，还须对其它文体有所涉猎，掌握多方面的艺术表现手段。结果，该班十八位学生在两年间不仅创作出三十多个大戏，四十多个小戏和小品（其中部分剧作已公开发表或汇编成《剧苑新葩》一书），还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诗歌、散文、小说和文艺评论。该班学生毕业后，普遍素质较高，具备较强的综合写作能力，可适应文化艺术单位多方面的需求，从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好评。其中许多人创作成果丰硕，荣获了各种奖励（包括“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国家级文艺奖）。

1989年，我们云南艺术学院又与《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一个综合写作班，由大学教师和作家、编辑、记者共同组成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向来自社会各界的文学爱好者传授各种文化知识，并以全方位地提高实际写作能力为指归。一百多位学生在一年学习期间，共发表了上千件文学和新闻作品。有的从未在报端面

世的学员竟连续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被评为省报优秀通讯员，甚至还被提拔为报刊的专业编辑记者。

以上两次教学改革的实践经验昭示我们：综合性艺术院校理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拓宽办学路子，尤其应该注重开设和健全文学课程，努力加强学生的文学素养，以至把造就复合型的一专多能的文艺创作人才视为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职责。于是，我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在戏剧系的有关会议上，不止一次地提出倡议：办作家班，主要从既有高中毕业文化又有一定社会阅历和创作经验的成年人里招收学员。年复一年，这一设想，一直恍若美丽而虚幻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

实际上，对于文科大学（主要是指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和综合性艺术院校）该不该、能不能培养文学创作人才，长期以来都存在着壁垒分明的不同意见，说确切点，是早已形成了一种顽固的似乎不容争辩的思想定势：高校教学与文学创作是格格不入的，上大学和当作家是水火不相容的。例如：“北大中文系在‘文革’前的入学教育开宗明义便是：‘我们系不培养作家、诗人，只培养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将学术与创作完全对立起来，往往愈到高年级，学识愈丰富，而才气愈削弱，行文愈呆板。毕业之后，不少学生便不会写散文、小说和诗歌，其论文也愈来愈八股，学究气十足。”（引自1996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载《学者作家化浅说》）“和北大中文系一样，我国所有的大学中文系都不是以培养作家为目的。北师大中文系的培养计划和方式也是基于培养一个合格的中学教师这一目标。”（引自1998年8月4日《文艺报》载《我能当作家吗？——来自大学中文系的消息》）确实，新中国成立以后，没有一所大学、一个系、一个专业以造就作家为目的的。其它院校、系科都能理直气壮地宣称：它们培养的目标是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家（或人民教师）、医学家（或医生）、农艺师、哲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例如清华大学等就十分明确地将本校定位为“工程师的摇篮”。独有文科院校对“培养文学创作人才”与“作家的摇篮”之类提法讳莫如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怪诞而发人深省的现象。究其原因，或许有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如在“左”的思潮干扰下，对文学界成名成家思想

及“一本书主义”的批判特别凶猛，致使搞中文的谈“家”色变。但我认为，更主要的根源是在思想认识上存在着误区和盲点，在教学的体制、内容、方式上因循守旧，固步自封。

“作家不是从大学里培养得出来的。”这种流行的绝对化说法几乎成了不刊之论，也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对这个问题不作辨析，不加区分，笼而统之地断而言之，就会得出十分片面的狭隘的结论，从而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文科教学的改革开放。诚然，一个作家的诞生和成长，是由众多复杂的因素决定的，诸如：雄厚的生活资本，广博的知识学养，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敏锐的情感反应，以及对把握语言艺术的特有的悟性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一切素质都不是生而有之的，主要是在家庭、学校、社会环境中长期濡染、熏陶的产物，也是个人着意开掘、发展有关天赋和爱好的结果。而这一切素质的形成，与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非但没有矛盾，而且后者对前者只应产生积极的催化效应和提升作用。回顾现代文学史，鲁迅、茅盾、闻一多、朱自清、老舍、叶圣陶、李广田、沈从文、公木、冯至、卞之琳、吴组缃等等大作家，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学教师。过去和现在许多成绩斐然的作家也都是大学生出身。当然，不可否认，不少人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并非中文系科班毕业，也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甚至成了大功，就了大名。但是这些通过“社会大学”而自学成才、成家的现象，并不能否定高等教育本身的重要价值，也不可证实其“逆定理”的成立，即：大学中文系出来的学生一律不可能当作家。否则，岂不又陷入了“上大学无用论”的迷津。

中文系之所以培养不出很多大作家来，除了其原本就排斥文学创作的既定目标外，问题的症结在于：中文系那一套传统的办学思想、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学习、考试方法乃至整个教学体系，都严重地远离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轻视对当代国内外新鲜、丰饶、变动不居的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接触、研讨和抑扬吐纳，与文学创作实践更是大大脱节，格格不入。这一套陈旧、僵固的教学模式，从中学语文课机械、刻板的应试教学沿袭而来，习久成性，束缚了学生自幼形成的感悟艺术形象的天性潜质，禁锢了他们对名篇佳作的审美欣赏，压制了他们提笔作文的灵感思维和创造精神。那些教条化、概念化、公

式化的新八股式的教学法则，那些过于理性化的支离破碎的作品解析和字句诠释，那些死记硬背的考试方法，无一不挫伤了广大学生学习语言文学的热情和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进而对这一门本来非常生动、活泛、有趣的学科感到索然无味，敬而远之。难怪曾经担任过北大作家班班主任的博士生导师曹文轩教授感慨系之地说：“现在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中文系的学生在上本科时还有一定的才气，到了上研究生时才气已去了一半，等他上到博士时，他的才气基本上已没了。所以现在大学里文学作品写得最好的是本科生，其次是研究生，最次则是博士生了。这点跟我们大学中文系的教学方式有关。”（引自1998年8月4日《文艺报》头版头条文章）

所以，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令人感到沉重而痛楚的事实，不能不清醒地深思中文教学的改革问题。大学中文系本来是可以成为培育作家的摇篮和基地的，至少它能增强学生的创作欲望和动手能力。现在学历越高，读书越多，越不会创作，越写不出好作品，这不能归咎于知识和学问本身，而只能在振聋发聩之后，直面弊端，寻根究源，从教育观念到教学机制上都来一个深刻的变革和创新。

近十几年来，我们正是试图在戏剧文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方面探索、开拓一条新路。1995年我们在成人高等教育的范畴内，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式呈递了申办戏剧文学函授大学作家班的报告，详细论证了在综合艺术大学创立这个新专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一整套教学方案、计划以及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措施、师资来源等等具体意见。当时云南艺术学院、省教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是理解和支持的。

云南省文联、作协负责同志和许多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老、中年作家也是热情关心和扶植作家班的开办的，他们认为这是培养文学新人、繁荣云南文学创作的大好事，是他们应当积极参与和合作和鼎力协助的份内之举。著名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同志对于在云南创办作家班格外重视，倍加鼓励，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建立、发展文学系的光辉历程和成功经验。这使我们更加坚定地确信，遵循鲁艺的方向道路，结合今天新时期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造就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学以致用文学创作人才，不仅符合时

代和人民的需求，前景也是广阔的。

早在 1938 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发起和创办的我党第一个综合性艺术大学——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率先设立了文学系，并将文学作为全校的带头、骨干专业，培养了一大批成绩卓著的文学创作人才。当时的院长周扬、副院长沙可夫、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和许多师生如茅盾、丁玲、艾青、周立波、沙汀、李季、卞之琳、陈荒煤、冯牧、贺敬之、康濯、严文井、葛洛、秦兆阳、穆青等等，都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可见鲁艺的文学大军阵容之强大，实力之雄厚，功绩之丰伟。历史已经证明，综合艺术大学是应当而且可以培养作家和文学创作人才的。鲁艺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的基本原则都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非常遗憾，鲁艺在艰难困苦战争环境和异常简陋的教学条件下所建树的上述丰功伟业和优良传统，在新中国建立后没有进一步坚持和发扬。半个世纪来，艺术院校只剩下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专业，而把广义的文学专业几乎完全摒弃了，鲁艺所固有的培养文学创作人才的任务被一笔勾销。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艺术教育的一大缺憾和损失。（尽管现在各艺术专业毕业生的学位证书都冠以“文学”二字，如“文学学士”等。）

文学与艺术是同一范畴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又是一种重要的艺术门类，一般文艺理论根据文学的特性，将其指称为语言艺术、想象艺术或时间艺术。文学与其它艺术既有区别又有广泛的联系，它是一切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创作基础。文学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艺术人才的人格生成和艺术品位的优劣精粗。因而，艺术院校应当加强文学教学，这是完善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总体素质的重要手段。一切艺术院校、艺术专业都必须把文学列为重要的基础课程，结合各类专业安排不同的文学科目和教材内容。综合性艺术大学更应当重视文学教学，并尽力创造条件培养复合性高等文学创作人才；严格地说，没有文学专业的综合艺术院校是名不副实的，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艺术教育体制。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许多高等学校一直存在着重专业、轻学养的倾向，片面强调培植“专才”，忽视整体素质的提高。多数艺术院校更是片面强调艺术专门人才的特殊性、排他性，从招生到教学都是重视专业，忽视学识，重视专业技能课，轻视文化基础课。文学课

程实属无足轻重的副科，领导对其要求不严，教师对其抓得不紧抑或无能为力，学生更是不以为然，应付了事。缺乏系统、完善的文学教育和文学陶冶，是目前艺术院校学生文化修养普遍不高，创造活力不强的一大原因，这不仅导致整体素质的缺陷，也严重地阻碍了专业学习和艺术造诣。现在从事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专业的不少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在艺术领域里作为不大，他们的作品之所以缺乏文化底蕴和书卷秀气，追本溯源，是与文学水平不高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是艺术院校轻视文学教育而呈现的一种恶果。

基于上述客观情况和理由，我们认为，提高文学教育在艺术院校的地位，在综合艺术大学恢复和发展培养文学创作人才的专业，以至创办作家班之类的教学实体，都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正因为为在艺术院校开办作家班是教学改革中的一种创举，也是很有意义的好事，云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都给以极大的关怀、热情的支持，并赐予具体的指导、帮助。现任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王天玺，原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赵廷光等同志亲自担任本班顾问和兼职教授。当国家教委于1996年1月正式下达文件批准我们招生后，《云南日报》等新闻单位立即进行义务宣传；省教委、省作协和一些地州市的宣传、文化、教育部门及报纸、电视台等也配合我们做了许多宣传报道、推荐生源、组织报考等工作，使我们深有“得道多助”之感，备受鼓舞。大家努力的结果，在短促的一个月内，便有数以百计的文学爱好者从四面八方云集昆明，要求上作家班学习，甚至连上海、湖北、四川、贵州等外地也有人闻讯申请报考。

经过专业考试（命题散文和文艺评论写作）和全国成人高考的严格遴选，共有五十余名考生被录取。他们有些是省、地、市级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会员，有些是文联、文化局、剧团和报刊的负责人，有些是宣传文化部门的专职文艺干部，有些是报刊编辑、记者，有些是党政机关、学校、企业、农村、医院和空军、武警、公安部队的创作骨干与文学爱好者。令人惊喜的是，其中一部分学员（18名）已有大学本、专科学历，有的甚至已获得高级技术职称和处级干部待遇，他们上作家班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凭和经济利益，而是出于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对文学创作的执着的热爱。有的学员从家乡来到省城，一

边打工，一边上学，用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去交学费，买书本，令人感慨不已。学员中的少数民族有：来自苍山之麓、洱海之滨的白族，来自哀牢山区的彝族，来自中缅边境线上的阿昌族，来自滇西北高原雪域的纳西族，甚至还有云南稀有的蒙古族。鉴于许多人错过了报名时间，仍强烈要求入学，我们又陆续招收了一部分条件合格的进修生、旁听生；其中不少人经过第二年全国成人高考，已取得正式生资格与首届作家班学员同步学习。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及不同文化程度和写作基础的男女学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志向，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包括工作、时间、经济、家庭等方面的问题、矛盾和压力），走进了他们向往已久、梦寐以求的作家班。在当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世俗主义甚嚣尘上，精神文明严重滑坡，纯正文学的市场价值一落千丈的境况下，竟然还有那么一批虔诚的文学朝圣者，力排物欲横流的污浊浪潮，坚持要在文学领域开辟一片真善美的净土，进行孜孜不息的耕耘，为宏扬民族文化和建设精神文明的事业而刻苦自励，尽心竭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而有的报纸以“众人忙下海，学子登文山”为标题，予以盛情赞扬。同学们赤子般的拳拳之忱和进取精神，又深深地感动了校内外的教师们，大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从而推进了整个教学工作的改革、开放和发展。

二、作家班的教学改革之路

作家班特有的培养目标，确定了它的教学宗旨是提高文学创作水平，其教学的中心内容是传授各种文学知识，领会和掌握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和基本方法、技巧。由于本班归属于艺术学院函授大学的戏剧文学专业，其学习形式以函授为主，面授为辅，实行自学和辅导、写作实践和学习理论相结合；又由于广大学员是各行各业的成年人，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专业特长和社会生活领域，因此，不可能也不必要像全日制全脱产的在校大学生那样，主要是在课堂里听讲，按部就班地学习理论知识；也决不搞满堂灌和填鸭式的授课方法；更不应采用死记硬背各种名词、概念和现成结论的考试手段。一切教条主义

的食而不化的教学模式，只能铸造思想僵固、缺乏创新精神的“知识传声筒”，或曰装满各种文字符号而不能利用的“两只脚的书柜”。有鉴于此，我们从本班的实际出发，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和探索。

首先，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上，我们恪守少而精和学以致用用的原则，既与普通高校的中文系有所不同，又与一般艺术院校的戏剧文学专业大相径庭。

作家班开设的课程，除了教育部、文化部对艺术院校统一规定的共同课（《政治理论》、《艺术概论》、《中外名作选讲》）之外，专业课主要有：《新闻采访与写作》、《诗歌创作》、《散文创作》、《报告文学创作》、《小说创作》、《戏剧文学创作》（主要是话剧和戏曲剧本创作）、《电影电视基础》等。显而易见，这是为了使学员较全面地认识和掌握各种文体的特点、本质及主要创作法则。我们认为，虽然不能要求文学作者对每种文体都很精通，都能娴熟自如地驾驭，但是他们应当明了各种文体的基本状况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对于造就一专多能的创作人才是完全必要的，也有利于学员在比较之中深入研究某种文体，在重点发展各自喜好和擅长的文体时借鉴、吸取其它有关文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此同时，还开设了一门新颖、独特的《作家学》，较系统地分析、概括了古今中外作家们成长的主观因素、客观条件，作家创造性劳动的共通规律和个性特征等等，这对于提高文学创作者的职业素质和他们的自我完善，都是必要的。

此外，为了增强学员的文化素养，扩大学员的艺术视野，帮助他们建立广泛的信息网络，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作家班开设了内容丰富、灵活多样的专题课，如美学基础理论、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审美鉴赏等等。有时采取请进来或者走出去的方式，请有关领导和专家介绍当前文艺界的理论热点、创作动态以及有关信息。

为了建立全方位开放的教学体系，必须组织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完备、专业理论水平高超、创作实践经验丰足的教师队伍。为此，除了调配本校一部分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教授、副教授担任一些基础理论课、文学专业课和艺术专题课外，我们还广开师门，八方求教，

依靠社会力量共同办学。我们首先聘请了省内许多著名作家、教授前来上课，如：诗人、评论家、云南省作协主席晓雪，老作家、中国作协顾问李乔，老作家、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苏策，一级作家张长，省作协副主席汤世杰，省作协副主席黄尧，昆明市文联主席李必雨，昆明市作协主席李霁宇，省文联副主席刘鸿渝，彝族作家陈志鹏，评论家、云南社科院研究员蔡毅，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丛中、杨振昆、乔传藻、金丹元，云南师范大学教授骆小所，以及《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的副刊负责人杨伊达、原因，《云南日报》记者部负责人刘祖武等。他们都各擅其长，结合自己的理论建树和创作经验，把许多重要而深奥的学术观点和艺术问题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有骨有肉。一般说来，他们传授的知识、技巧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常能针对云南特殊的地域、民族文化状况，从学员的创作水平和实际需求出发，使大家得到一些切实有效的启示和帮助。这些知识和经验在一般理论书籍、统编教材中是难以觅取的，这些成效也是照本宣科般的教学程式所无法企及的。

同时，我们还不时邀请一些海内外的作家、学者、评论家、编辑家前来讲课或座谈。他们大多数是因公到云南来的。如：著名作家、中国作协顾问汪曾祺，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龙、《中国作家》常务副主编章仲愕，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雷达，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范希文，《民族文学》编审查干，辽宁省作协副主席邓刚，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女作家张蔓菱，以及美籍华人作家刘墉，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主席吴新钿，香港著名女作家陈娟、金东方等。

此外，我们还结合文艺创作，邀请公安战线一等功臣刘华友、见义勇为模范何兴发（他们都是本班师生作品中的主人公）介绍他们的英雄事迹，与同学们座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担任本班顾问、兼职教授的省领导王天玺、赵廷光等同志在百忙中拨冗来作家班讲课、指导，把自己的著作赠送给学员们。这在全国教育系统想必是颇稀罕的事，也是本班师生的荣幸。

我们所以罗列那么一大串名单（三年中来本班上课者共五十余

人)，除对上述各位专家、领导表示深切、诚挚的谢忱之外，主要是想表明我们依照杜甫“转益多师是汝师”的精神，博采众家之长，兼收各派真言，让学员广泛汲取当代文化菁华，多方面吸纳营养丰富的知识食粮。这种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开放体系，不仅引进了大量的专家学者，解决了专业师资不足的问题，也活跃了学员的思想，这对学习文学创作是很有益的。

鉴于本班学员的文化基础和创作起点参差不齐，每个人对各种题材和体裁的爱好、熟悉程度和把握能力颇不相同，他们各自都有长处和短处、强项和弱项，为了互帮互学，取长补短，我们非常注意开掘本班学员的自身潜力，以“兵教兵”和“能者为师”的原则，让一部分学员提携、带动另一部分学员，乃至帮助他人修改作品，推荐发表。我们还安排创作经验较丰富的学员当“小先生”，走上讲坛，向全班同学介绍经验，交流心得。我们还围绕学员的作品开展过多次研究讨论活动。这对于互相勉励、互相切磋，营造一种浓郁、健康的比学赶帮的创作氛围，无疑是有利的。

回顾三年的学习生活和创作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作家班已树立起团结友爱的班风，形成了一个向心力、凝聚力颇强的集体，建立了弥足珍贵的新型的人际关系。

作家班最鲜明最突出的办学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结合和高度统一，既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正确总结和指导意义，又强调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印证和丰富补充，尤其是把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放在第一位，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最终目的，是扎扎实实地提高文学创作能力，以求现在或将来能够完成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这是与目前任何文科院校（包括中文系）任何专业的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都不相同的。

为此，我们要求学员首先在本地区、本系统、本部门深入生活，努力工作，密切群众关系，把审美的视角对准周围的一切人、一切事物、一切环境，注意反映和歌颂自己熟悉和热爱的生活，尽可能把文学创作与本职工作或本人的日常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领导的理解、支持，使自己的创作成为当地或本系统的文艺事业的组成部分。当然，与此同时，我们鼓励学员扩大生活面和审美视野，以开掘新的